

“5·12”三周年特别报道

# 中国模式：世界共享

■ 本报记者 郭玉志 实习生 张潇艺/文

5月8日上午10点,重庆,力帆集团汽车销售公司门前,6辆力帆SUV汽车,20多人的团队整装待发。  
 “我们此次行程总共5天,途经汶川、北川、绵阳等地。”力帆集团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陈荣告诉本报记者,在“5·12”汶川地震三周年之际,公司再次举办支援灾区活动,有着特殊的意义。

“重庆和四川是一衣带水的关系,尤其是地震后,我每年都会去四川灾区。”陈荣告诉本报记者,汶川地震三周年任务提前完成,感觉我国政府非常强大,三年重建承诺完全到位,充分感受到灾区尤其是国家发展速度非常快。

从重建规划的前瞻性规划,到对口援建的制度性首创,短短三年时间,四川震后灾区重建工作乃至期间形成的中国重建模式,充分得到了世人乃至世界各国的认可和赞同。

4月25日至26日,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四川省委在成都举行的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理论研讨会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灾后重建的四川模式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专家表示,“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四川地震灾后重建,首次打破“先恢复、后发展”梯次重建的常规模式,应用“破窗理论”,加快灾后重建进度,形成“恢复与发展相融合”同步重建的新型模式,将其概括为发展型重建的四川乃至中国模式。

## 组织与效率：中国速度

“重建工程并不是一味地追求速度,重建速度必须服从于重建质量,将高标准、严要求贯穿于项目建设的全过程,把每一项工程都建设成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优质工程、精品工程。”课题组专家特别强调。

2008年5月12日,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一天,8级强震猝然袭来,山河移位,满目疮痍。四川,这个中国西部最适宜人们居住的省份之一,举世瞩目,国殇,人有爱。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梁平县因离震中汶川最近,一所学校以及多间建筑轰然倒塌,造成多名学生伤亡。

70岁高龄的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震后第二天就亲赴灾区现场,为学校孩子们及时送去爱心,并捐资300万元建造一所新的光彩学校。

尹明善的善举,在3年后仍然被延续。

陈荣说:“此次行程主要是一个公益行动和绿色环保主题的宣传,去力帆集团捐建的光彩学校回访,在灾区宣传普及节能环保知识,再次支援四川尤其是地震灾区的建设。”

而在浙江阿里巴巴总部,在地震发生后,立即成立“灾后重建工作小组”,并投入2500万元作为专项基金,专用于灾区灾后重建。

“地震时,青川花了3天才将信息送出。”阿里巴巴内部一位员工告诉记者,信息的闭塞拖了后腿,阿里巴巴决定支援青川互联网建设。

2009年4月,青川县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了《关于推进青川县电子商务应用合作备忘录》战略合作协议,计划用7年时间努力将青川建成西部电子商务强县。

短短3年,青川脱胎换骨,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记者从阿里巴巴了解到,就在4月11日下午,淘宝四川盟商青川分盟组织了与成都淘宝创业园网商、四川商盟网商代表进行座谈,目前已有3对网商开始初步交流合作事宜。

地震发生后,在抗震救灾第一时间,中国重汽集团捐助了价值2000多万元的现金和车辆支援救灾。

此后,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山东省对口援建灾情最重的北川。  
 中国重汽仅用了短短115天,一个投资20亿元的项目就建成投产。这是中国重汽集团绵阳卡车项目建设创造的速度奇迹。

这些企业作为经济细胞的中国企业在震后第一时间做出的抉择,在企业自觉交出合格答卷的背后,是四川灾区重建的速度和效率。

三年间,在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各个场合,“中国速度”格外引人注目。  
 在地震发生当天,我国相关部门就迅速在新闻媒体发布消息,消除坊间谣言。随后,国务院立即部署抢险救灾事宜。

翻看过去3年四川灾后重建的日历,从“百日攻坚”到“千日奋战”,从“项目书记”到“项目局长”,四川灾后重建缔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四川速度”、“中国速度”,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成都至都江堰铁路是四川省灾



2011年4月23日,“3·11”日本强震海啸重灾区宫城县气仙沼市仍在进行灾后清理。中国在汶川地震灾后构建起受灾地区与未受灾地区结对的援建网络,这种经验被应用于日本的灾后重建工作中。 孙自法/摄

四川社科院灾后重建课题组专家认为,四川模式在本质上既是灾后重建的中国式道路,也是灾后重建的四川实践、四川创新和四川方法,是在集中统一的抗灾救灾体制下形成的。这一体制以中央政府为核心,采取非常规手段进行统一指挥,集聚全国之力抗震救灾。在灾后重建中采取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以对口援建为手段,引导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迅速向灾区聚集,加上国际各界的大力支持,为四川创造灾后重建的奇迹提供了重要条件。

## 后重建的第一个重大项目,由中铁二局负责相关施工。

经过300天决战,中铁二局夺取了成都至都江堰铁路建设的全面胜利。  
 “在重建过程中,没有普通标准,只有最高标准。全部建设的项目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设计、施工。”中铁二局工会相关负责人罗冕告诉记者。

课题组专家表示,为了保证重建速度,通过开辟灾后重建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和“5+2”(即无工作日与休息日之分)、“白+黑”(即无昼夜之分)、“晴天苦干、雨天巧干”的顽强拼搏,大幅度缩短了建设工期。

“重建工程并不是一味地追求速度,重建速度必须服从于重建质量,将高标准、严要求贯穿于项目建设的全过程,把每一项工程都建设成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优质工程、精品工程。”课题组专家特别强调。

## 汶川经验：启迪日本

林家彬认为,通过总结日本阪神大地震对于我国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有5点启示:灾后重建工作中必须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重建工作要重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重建规划应按照轻重缓急统筹推进;产业复兴要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放在重要地位;产业复兴要把中小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

2011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三周

年。就在两个月前,日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3·11”大地震。

日本“3·11”大地震和海啸过去近两个月时间后,灾后重建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业内人士预计,相比1995年日本发生的阪神大地震,此次日本走出危机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有人认为是日本二战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

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日本已经建立起先进的地震防御体系以及灾后重建体系。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林家彬的研究显示,阪神地震发生后,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专门机构,以对灾后重建工作进行指挥、指导和协调。

随后,日本在1995年2月至3月间紧急通过了16项特别立法,作为灾后重建及震灾善后工作的法律依据。同时,日本震灾创建复兴基金,扶持灾民和受灾中小企业。

西南财经大学杨雯等在学刊发表文章认为,震后,日本神户市开始了长达10年的重建工程“不死鸟计划”,分“紧急、应急对应期”、“复旧期”、“复兴前期”、“复兴后期”四大阶段。

同样多灾多难的印尼和美国,其灾后重建工作也为人瞩目。

杨雯认为,纵观日本、美国等多灾国家的经验,其在震后救灾中有着相似的措施,例如,灾后立即成立专门的重建机构,保证救灾重建计划能顺利有序高效地进行;保险机构的全力赔付;利息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设立重建基金等等。

不仅如此,中国救灾重建中的对口支援,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灾后重建创新。中国所独创的经验和模式,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口援建经验在日本也得到了应用。参加过日本阪神地震重建的日本兵库震灾纪念21世纪研究机构首席专家、同志社大学教授林敏彦曾经亲身到过四川地震灾区并参加震后重建的研讨会。

林敏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四川的重建中构建一个受灾地区与未受灾地区结对的援建网络,发达地区为灾区提供居住场所和工作机会。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方法,类似的经验被应用于日本东北部的大地震及海啸的灾后重建工作,日本西部未受核辐射威胁的地区对东北部的家庭提供帮助,其形式类似于中国重建方案中的“结对子”。

通过总结国外灾后重建的经验,对于汶川地震以及我国应急救援体系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来看,3年时间,我国灾后重建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实质性突破。

据成都市政府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成都市3148个灾后重建项目已完工2956个,累计完成投资831.8亿元,城乡住房、道路、水利、电力和通讯设施重建基本完成,学校重建全面完成,生态环境逐步修复,灾区经济全面振兴。

## 对口支援：中国特色

课题组专家认为,四川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最为突出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发展型重建。

课题组报告显示,发展型重建作为四川模式的主要支撑,在发生特大地震灾害的特殊情形下,在中央和地

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依托举国支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体制机制,战胜灾难、化危为机、危难崛起,实现全面跨越和提档升级的科学发展过程。

日本阪神地震,最后一户人住新房用了7年时间;美国新奥尔良飓风之灾,6年多时间过去仍有一半人无家可归。

而5月的汶川,大山披上了嫩绿,油麦在春风中摇成了碧浪,新建的城镇静卧在雪山脚下,美丽得如同一朵朵绽放的莲雪……

“最短仅需27分钟。”一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于成灌快铁往返于成都市区与都江堰之间的快捷和方便。而仅仅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日夜机器轰鸣的工地,直到2010年5月12日成灌快铁正式通车。

“灾后重建中,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罗冕告诉记者,中铁二局人勇担央企责任,在川、甘两省30多个极重灾区和重灾区,为3200余名灾民群众建起了新家园,让20000余名孩子走进新校园,修建140余公里公路和铁路,完成100余亿元灾后重建任务。

这仅仅是灾后重建工作的一个缩影。

4月21日,为期数日的中外媒体“重返灾区看巨变”采访活动结束,由于日本和中国台湾处于地震多发地带,中国台湾、日本媒体记者对中国的对口援建模式大加赞赏。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决定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区”的原则,在世界上首创了对口支援机制。

广东、山东、浙江等21个省市立即行动起来,对地震灾区公共基础设施重建、住房重建、经济规划等方面进行“一对一”的支援。

课题组专家认为,四川灾后重建的成功经验在于搭建了对口援建双方合作和交流的平台,有效地整合了双方之间的优势资源,加快推进对口支援向对口合作转变,努力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援建合作格局。

“四川灾后重建中的援建不是代建,更不是包建,受援方要做好相关服务工作,积极配合和支持援建方推进项目建设,同时要充分发挥灾区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灾后重建与充分开放合作结合起来。”课题组专家在研讨会上说。

课题组专家表示,与此同时,四川模式又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有机结合。政府的主导作用表现在规划制定、政策支持、环境保护、组织协调等方面,不能缺位。而市场运作则体现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调动力量,整合资源,破解投融资难题。

3年的灾后重建成就不胜枚举,回顾3年走过的路程,课题组专家认为,四川模式的本质属性其实是中国式道路。

据了解,纵观国内外以往的灾后重建模式,大都采取了先恢复后发展的方式,即优先恢复基本的、紧急的住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项目,再进行产业重建,而在产业重建中大多也是以先“复原”为主,再考虑“升级”发展,其结果是灾后重建的速度比较缓慢,重建时间较为漫长,有的长达十年甚至数十年。

而四川、甘肃、山西等灾区经过3年重建,无论是灾区群众还是业界各方都普遍认为,重建使当地的发展水平比相对落后的震前至少迈进了20至30年。

(上接第一版)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像中建三局东汽项目一样,“哪怕不挣钱也要首先支持重建”的项目不在少数。同样是中建三局援建的汉源县体育馆项目,投标时钢结构报价20多万元,实际成本却花了100多万元。

“投标时赶得很紧,对于震后建设的难度之大预估得不充分,进场后发现材料组织起来很困难,运输成本高,有的材料根本满足不了实际建设需要,后来又追加了不少投入。”中建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据四川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办公室统计,截至4月底,包括广东在内的18个省、市,确定的对口支援项目3668个已全部开工,其中全部建成的项目有3629个;确定对口支援资金787.39亿元,最后到位以及累计完成投资额达795.95元,超额完成计划。尚不包括香港、澳门地区援建的283个项目以及配套资金。

正是由于援建企业的不讲价钱、不计辛劳,“三年重建两年基本完成”的目标得以实现。

## 谋共赢：实现产业对接升级

在宝成铁路西侧,总投资8.9亿元、占地面积6.7平方公里的河南工业园坐落在原江油工业园东侧,河南省援建的涪江三桥使之与城区相连。

这里原本是一片水稻田和沼泽地,如今变为现代化工业园区。  
 5月9日,在河南工业园东区机械产业区,作为河南省援建江油的第一个企业,总投资4000万元、主要生产通用深沟球轴承的江油洛轴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油洛轴”)开始试生产。

正在工厂车间检查工作的江油洛轴执行董事、总经理刘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公司长线产品能达到6个型号,试生产结束后,全部设备实现连线运转,预计年产能达400万套,可实现年产值3000多万元,利税300多万元,同时还能增加200多个就业岗位。”

同处工业园的江油洛轴、攀长钢和江油川矿集团,是三家“兄弟企业”。之所以成为兄弟,是因为我们自己探索出了3家企业共同盈利的新模式。”刘杰说。

刘杰告诉本报记者,他们的原料来自江油攀长钢,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近卖给江油川矿集团,“我们不仅仅省下运输成本,还建立了固有的销售渠道,最重要的是一个项目带来3家企业共赢发展。”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攀长钢”)党委副书记刘映乐介绍说:“在灾后重建中,我们改过去的分散经营为集聚发展,新确定棒线材连轧、线材、炼钢连铸等11条生产线建设项目,并从德国、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淘汰一批落后产能。”

河南中平能化集团、洛阳中信重工、河南天丰节能集团等一批优势产业项目纷纷在江油落地生根,未来,河南工业园的工业产值有望占据江油市的半壁江山。

“这些项目将使江油的传统冶金产业向制造业延伸,将为我们江油‘十二五’规划的落实起到十分巨大的作用。”江油工业园区党委书记庞华均说。

豫籍企业入驻江油工业园区以及随之带来的灾区产业升级,是整个灾区实现产业对接、升级的一个缩影。

2009年3月31日,四川重灾区省级以上开发区新设工作启动,不管是单个项目,还是整个产业链都向园区集中和延伸。

到2010年底,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产业园区集中度均达到70%左右,高于四川全省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以上,全省仅有的2个千亿园区、7个500亿园区中的5个、41个100亿园区中的14个都在灾区。

“地震前,做梦都想在北川搞工业集中发展区,但在老北川县城根本找不到一块集中连片的土地。震后,北川异地重建,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想方设法在新县城搞一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北川羌族自治县副县长李斌介绍说。

在对口援建的山东企业支持下,这个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北川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12.87平方公里,将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环保新材料、食品药品加工等产业。李斌表示:“北川-山东产业园是北川经济开发区的起步区,是山东和北川由对口援建转向对口合作的重要平台。”

四川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在恢复重建过程中,东汽、二重、阿坝铝业等重点骨干企业借势推动了技术升级,产能扩张。

## 求跨越：灾区一步迈进20年

回到北京半年后,什邡市冰川镇的两年生活仍历历在目。  
 从“5·12”地震后赶回北京献血时起,工程师闻登一就一直在向院里申请赴川工作。2008年11月,作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什邡援建项目负责人,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川。

“地震后,灾区生活设施基本为零,水、电、生活用品供应不上,而且气候变化明显,余震、山体滑坡、泥石流经常发生,这给援建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闻登一5月6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比方说本来是一个鱼塘,挖一点土就可以盖房子,但实际上挖了很深发现还是泥,并不适合开展建设。”

在北京市援建什邡的前线指挥部,闻登一和战友们从技术层面做了大量“消化”工作,才重新开始建设。

即便困难重重,灾后重建项目仍以高标准进行。  
 从2008年11月4日起,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组成“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科技特派团”,全面对口帮扶北川。短短半年,便完成了省道105线北川县曲山镇至安昌镇路段的总体规划方案,编制出农村住宅抗震建设及农宅危改相关标准的实用教材。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龙承东说:“我们力争原址、原材料、原工艺重建,但是在注重传承的同时,也注重提升。我们的规划工作,从设计、技术、经济发展到文化传承保护全方位展开。”

在做村镇发展规划的同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还“附赠”了旅游发展规划,挖掘出当地独具特色的种花、种茶等旅游元素,帮助灾区经济复苏。

“当地人过去想过但做不到的,我们帮他们实现了,当地人没想过但有潜在需要的,也被我们实现了。”闻登一观察到,“冰川镇的村民变成了居民,住进了新建的楼房,各家普及了电脑、电视、电话,更重要的是不再种地了,而是以旅游、商业为生。可以说,灾区的生产、生活水平,至少推进了20年。”

据四川省文化厅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四川有1053个公共文化设施重建项目开工,完成投资20亿元,占规划总投资的76%。通过灾后重建,灾区公共文化设施的硬件建设一跨跨越20年。

灾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得益于重建中企业普遍采用的高标准。而重建之后灾区生活巨变的适应过程,也需要援建企业付出更多的耐心。

“汉源县体育馆是湖北省对川灾后援建的第一个项目,技术标准要求很高,我当时是公司的工程技术部经理,被派到汉源体育馆做项目经理。”现任中建三局成都公司明月锦苑项目经理孙德明告诉本报记者。

2010年7月项目移交汉源县委后,孙德明仍充当着汉源体育馆技术指导员角色。  
 技术人员培训需要两个月时间,但是在灾后重建的特殊时期,汉源县抽不出人来学习设备使用。孙德明说:“这个项目档次高,设备先进,当地人很多设备都不会用。交工之后,一到举办大的活动时,消防、空调、发电机运转不了,我们就要从成都派人去解决。”